

北方考古论文集

田广金 郭素新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北方考古论文集

田广金 郭素新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汇集了作者多年来在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内容有三部分：(一)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着重介绍了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编年和谱系；(二)北方畜牧—游牧民族的考古学研究，着重阐述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三)在区域性聚落考古及环境考古学研究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人地关系的演变规律。

本书可供考古、历史、民族、人文工作者及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考古论文集/田广金, 郭素新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ISBN 7-03-009726-2

I. 北… II. ①田… ②郭… III. 文物—考古—中国—文集 IV. 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5027 号

责任编辑: 杨新改/责任校对: 宋玲玲

责任印制: 钱玉芬/封面设计: 王 浩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4 1/2 插页: 2

印数: 1—1 300 字数: 566 000

定价: 8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前言

一

在韩建业、杨新改的建议和热情支持下，我们从自己历年所写的论文当中，选择了20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编成这本集子。按照其编排顺序，内容依次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北方畜牧—游牧民族的考古学研究和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研究。这三个部分基本能够反映我们在考古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每部分论文主要依据内容而不是以写作次序排序。其中《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环境考古研究》两篇是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培军博士一起合写的，《岱海地区距今7000~2000年间人地关系演变研究》一篇是和北京大学的唐晓峰博士一起合写的，也一并收集在此。一直以来，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方”或“北方历史—文化区”，区域范围以科尔沁沙地到鄂尔多斯高原一线为主体，外及冀北、晋北、陕北、陇东乃至整个蒙古高原。总体上以鄂尔多斯高原和岱海地区的考古发现为基础。

1965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我们一起被分配到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工作。由于赶上“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几年时间。到“文革”后期的1973年，在杭锦旗桃红巴拉清理了几座早期匈奴的墓葬，并征集到一批所谓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接着又调查发现阿鲁柴登、玉隆太、西沟畔等墓葬。从此，坚持走以田野考古资料为基础，从考古学上研究北方畜牧—游牧民族文化的路子。1979年在凉城县又发掘了毛庆沟墓地（时代相当于春秋至战国晚期）。1980年将上述几项考古发现汇编成《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一书（文物出版社，1986年）。

1974年举办文物干部培训班时，对鄂尔多斯地区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考古调查，其主要目的就是想寻找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在调查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朱开沟遗址，尤其是对朱开沟遗址出土的各种型式的陶鬲十分感兴趣，注意到其与中原陶鬲同中有异。为了进一步了解此类遗存的文化内涵，立即对该遗址进行试掘，明确了这是一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遗存，在内蒙古中南地区属首次发现。1977~1984年进行了较系统地发掘。朱开沟遗址文化内涵丰富，不仅特征鲜明，而且延续时间和分布地域明确，成为内蒙古中南部极具代表性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在朱开沟遗址不仅发现了独具特色的蛇纹鬲、甗和三足瓮等陶器群，而且发现了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环首刀、铜牌等与早商风格的直内戈共存，从而使我们意识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及其北方畜牧民族的起源地可能就在朱开沟文化范围内。朱开沟遗址发掘报告已经于2000年出版（文物出版社）。

岱海地区的考古工作，是从1979年开始的。为了编写毛庆沟墓地发掘报告，于

1980年春对周围地区的人文环境背景进行调查时,发现了龙山时代早期的老虎山石城聚落遗址。又经1983年的钻探和发掘,初步了解到老虎山遗址是一处保存比较完整的聚落遗址。当我们把几年来考古发掘收获向苏秉琦先生汇报时,得到了先生的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4年在苏先生倡议和指导下,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了“内蒙古西部区原始文化研讨会”,俞伟超、张忠培和严文明等先生对内蒙古的史前考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发表了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先生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下,我们下决心在岱海地区将区域性考古工作坚持下去。在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文化厅领导的支持下,1984年在遗址附近筹建了工作站。随后,在岱海北岸又调查了西白玉、板城、园子沟、大庙坡等龙山时代早期遗址。1986年,在老虎山遗址进行了补充发掘;1987~1988年,对园子沟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发掘工作;在西白玉、面坡和板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的钻探和试掘。通过这一系列的野外调查和发掘工作,我们对老虎山文化聚落遗址群的详细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在上述工作的同时,我们又在岱海南岸调查了红台坡、东滩、王墓山坡上等仰韶时代遗址。1989年,在配合丰镇—准格尔铁路建设时,发现了仰韶时代中期的王墓山坡下聚落遗址。这样,在岱海地区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先后调查了自仰韶时代早期至龙山时代早期的史前遗址30余处。我们对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时期遗址间不仅文化内涵差异很大,而且上下之间在年代上还有相当长的时间空档。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开始注意各个时期自然环境变化对人类活动的作用问题。从1986年开始,我们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培军合作,进行内蒙古中南部环境考古研究。其核心工作是研究不同时期原始文化的区域环境总特征,分析其地域与非地域性差异,从而为探讨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特征、文化区系类型差异和形成背景等,提供环境依据。

以上各项工作在取得了初步成果后,于1989年秋又在老虎山工作站召开了“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讨会”,严文明、李伯谦、韩伟和乌恩、杨虎、刘晋祥等先生对我们的工作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鼓励我们把本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工作继续深入下去。1990~1991年对王墓山坡下聚落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发掘,同时,又试掘了王墓山坡中和红台坡上遗址。通过上述工作,我们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文物分布概况、考古学文化编年和谐系,以及有关北方民族青铜文化研究等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对岱海地区史前聚落遗址的综合考察,对了解各时期的聚落形态,以及考古学文化与自然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即人地关系),探讨该地区农业文化起源和早期文明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等,均提供了详实的科学资料。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亲临实地考察。1993年和1994年,以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会长、大手前女子大学秋山进午先生为首的,由东京、九州等大学考古研究机构组成的考察组两次来内蒙古访问考察,对内蒙古的考古学研究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对“内蒙古长城地带”的考古研究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中日学者间的接触和交流,日本学者主动提议由日本文部省提供资金和设备,进行“岱海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及“游牧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的综合考察工作。1995年,中日学者组成了“中日

岱海地区考察队”，在 1995~1997 年的三年中，先后对王墓山坡上、石虎山、板城遗址和饮牛沟墓地等进行了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总之，自从朱开沟遗址发掘后，我们就一直追寻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所代表的北方畜牧民族的渊源，一直到老虎山等遗址的发掘，逐渐明确了北方民族是由长城沿线的农业民族转变而来，并意识到由农转牧的原因可能与气候环境由暖湿向干冷的转变有关。1986 年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史培军的切磋交谈更加强了这种认识。同时，我们合作在气候变化极度敏感的岱海地区开展环境考古工作。经过几年的工作，现在已初步揭示了岱海地区人地关系的主要内容，并对内蒙古中南部人地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早在发掘朱开沟遗址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大规模揭露出聚落全貌的重要性，发掘老虎山遗址时更着意从这方面努力。但真正意识到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去做工作，则是在 1986 年发掘园子沟遗址以后。这一方面是因为园子沟遗址有着大量保存较好、结构布局清楚的窑洞式房屋，更为关键的是，严文明先生等所倡导的聚落考古的思路和工作方法，给予我们极大的启发和指导。从 1986 年以后，几乎我们的每项工作都贯穿了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的内容，而这两项内容又都适合以小区考古作为基础。因此，我们近些年的研究基本集中在了岱海区域考古上面。现在《岱海考古》一至三集都已经出版（科学出版社），也算对各位师友有了交代了。

二

本文集的第一部分，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部分，包括了 6 篇论文。《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一文是近年来写的一篇综合性论文，对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了系统论述，并探讨了考古学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和《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两篇，从对典型遗址的分析入手，对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期和龙山时代文化谱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内蒙古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是对内蒙古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工作的总结。《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回顾》则对区域性考古取得重要成果的岱海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历程进行了回顾，强调了区域性考古在现阶段的重要性，总结了在岱海地区考古中进行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的经验。《内蒙古长城地带不同系统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及相互影响》一文，在分析内蒙古中南部和东南部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区域特征的基础上，讨论了相互间以及与周围地区的文化关系。

本文集的第二部分，即北方畜牧—游牧民族的考古学研究部分，包括了 8 篇论文。《源远流长的北方民族青铜文化》实际上是为《中国青铜器全集·北方民族卷》所撰写的概述，用较大的篇幅，从北方民族青铜器的发现和研究、类别和功用、动物纹造型艺术、动物纹造型艺术中东西文化的融合、铸造工艺等方面，对北方民族青铜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最后提到北方民族青铜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演变都与自然环境的演

变息息相关。《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在讨论了中国北方系青铜器产生的环境背景之后，主要分商末周初和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两大阶段，重点论述了北方系青铜器诸文化或类型及其相互关系，还讨论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的类型和族属问题。《中国北方畜牧—游牧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认为长城地带的畜牧业，实际上是在农业的基础上，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所发生，而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向游牧业的转化，也都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有关。《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和《再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两篇论文，以朱开沟遗址的重要发现为出发点，通过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的时空范围，以及分布区内部各文化类型及其陶器谱系的考察，提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可能就起源于鄂尔多斯及其临近地区，也就是朱开沟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此后才传播到长城沿线其他地区，再进一步远及外贝加尔等地区。这也就是北方地区畜牧—游牧业发生和发展的基本过程。以下关于匈奴的两篇论文的写作时间稍早。《匈奴墓葬的类型和年代》一文，主要对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匈奴墓葬的类型以及各类型的年代进行了梳理，大体上将自春秋晚期至东汉晚期分布在中国、蒙古和前苏联境内的匈奴墓葬分为四个阶段。《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则重点论述了各时期匈奴文化的面貌及特征，讨论了匈奴的活动地域、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提出匈奴的主体文化即为战国以前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是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篇，论文将北方分为东西两个区，探讨了两个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至秦统一前文化发生发展的脉络及其相互关系，论述了北方草原文明（即匈奴文明）的特征及其形成过程，指出环境变迁是导致文化发展和变异的主要原因。

本文集的第三部分，即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研究部分，包括了 6 篇论文。《环岱海史前聚落形态研究》实际上是对岱海地区多年来聚落考古工作的总结，分析了岱海地区史前时期各聚落的空间结构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并探讨了岱海地区聚落演变及其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则重点讨论了龙山时代前后在内蒙古长城地带出现的石城聚落，认为这种现象是氏族部落集团间矛盾急剧扩大的产物，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中自有其一席之地。《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一文，从五个方面讨论了北方长城地带环境考古学的问题，提出长城地带是重要的农牧交错带，大同一集宁—二连浩特一线是历史上农牧交错带东部与西部区的重要分界线，正是由于局部地区环境及受邻近地区文化影响程度不同，才表现出次一级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区系的差异。《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环境考古研究》一文，对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和所处的自然环境进行了论述，提出该地区自然环境及其演变对原始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具体来说，旧石器时代以调整工具为其表现，新石器时代以改变土地利用方式为其表现。《岱海地区距今 7000~2000 年间人地关系演变研究》从分析老虎山全新世沉积剖面入手，探讨了气候变化极度敏感的岱海地区该时期内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环境演变的亦步亦趋的相互关系。最后一篇《从生态环境看人与自然》，是应香港《明报月刊》之约撰写的带有普及性的文章，主要以岱海地区的人地关系为例，讨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除这部分的 6 篇外，前两部分中的多篇论

文，就已经涉及聚落和环境考古；尤其是环境考古的内容，几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每篇论文中都能够见到。因此，这一部分只是将较为集中讨论聚落和环境考古的几篇放在一起。

可以说，我们在内蒙古工作三十余年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离不开关心我们的各位师长的悉心指导和同行们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学习和研究北方考古的过程中，已故的苏秉琦先生随时给予我们指导和鼓励，先生的长者风范和渊博学识，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此文集也算是我们追思先生的一个纪念。北京大学的宿白、吕遵谔、邹衡、俞伟超、严文明诸位老师经常鼓励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严文明老师对岱海考古工作的指导和帮助更令人难忘，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还要感谢曾与我们合作的史培军、杨泽蒙、韩建业和杨新改等。

作者

2003 年 5 月 1 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

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	(1)
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	(24)
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	(57)
内蒙古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	(76)
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回顾	(100)
内蒙古长城地带不同系统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及相互影响	(111)

第二部分 北方畜牧—游牧民族的考古学研究

源远流长的北方民族青铜文化	(126)
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	(160)
中国北方畜牧—游牧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200)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	(215)
再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	(234)
匈奴墓葬的类型和年代	(244)
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	(256)
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	(274)

第三部分 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研究

环岱海史前聚落形态研究	(287)
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	(328)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	(342)
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环境考古研究	(350)
岱海地区距今 7000~2000 年间人地关系演变研究	(364)
从生态环境变迁看人与自然	(378)

第一部分 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

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

一、前言

内蒙古中南部位于黄河一曲之处。其文化地理范围，东自张家口—锡林浩特一线，西至包头—东胜—神木一线，北迄阴山脚下，南达晋陕，以长城为界。该地区又恰好处于中国北方季风尾间区及其边缘。所谓北方季风尾间区，是东南季风、西南季风与西风环流共同作用的地带，年降水量的整体南北移动和东西相异变化是尾间区降水变化的基本特征^[1]。由集宁至二连浩特一线是季风尾间区东西分异的重要分界线，这条界线西侧的过渡地带（包头—东胜—神木一线之东）属东南季风、西南季风与西风环流交绥作用地带。西南季风加强使东西分界线东移（达张家口—锡林浩特一线），东南季风加强则使东西分界线西移，西风环流加强则使整个尾间区界线向东南移动，东南季风与西南季风都加强则使整个尾间区界线向西北推移。

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如果以南北走向的太行山山脉为界，东部为面向海洋的鼎文化区，包括早期的釜和支脚；西部为面向内陆的鬲文化区，包括早期的尖底瓶；太行山北端长城以北的西辽河流域为面向草原的筒形罐文化区^[2]。内蒙古中南部正位于这三大文化区的中介地带，故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不仅是各时期各种文化因素汇集的地区，也是记录各时期各种文化东、南、西、北传播或渗透频率最清楚的地区。

内蒙古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基本上处于考古调查和资料积累阶段。80 年代以来，对这个地区文化遗存的编年和谱系研究，许多学者已发表过卓见，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已逐步取得了共识，但仍存在着对同一考古学文化采用多种称谓、新旧名称并用，或将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划归同一文化等混乱现象，反反复复，让人不得要领。正如严文明先生所说：“如果每发现一个更好的遗址就更改一次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势必不胜其烦，并且容易引起混乱”^[3]。这给学术界了解和运用这些研究成果带来诸多不便，已经严重影响了对这一地区原始文化的深入探讨。杨虎早在 1984 年就指出：“不宜用仅作过调查的地点命名；避免对同类文化性质的遗存用多种名称；防止把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当作不同文化”^[4]。最近，杨杰也写

* 指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原载《考古学报》1997 年 2 期。

出专文罗列了各家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一览表^[5]，表中以命名者分类，其中的第二类即将同一种遗存命名为多种文化或类型，现摘录如下：“阿善第一期文化、白泥窑子第一种文化（岔河口型、岔河口文化）、阿善第二期文化、白泥窑子第二种文化（海生不浪型、海生不浪文化）、阿善第三期文化、白泥窑子第三种文化（石佛塔型、阿善型、阿善文化）、白泥窑子第四种文化……^[6]。以后，又进一步论述了‘海生不浪文化’，并提出另外两个可供参考的文化名称，即‘阿善二期文化’和‘庙子沟文化’，同时还提出了将‘以白泥窑第一种文化为代表的，包括阿善一期、西园一期等一类文化遗存’，定名为‘白泥窑文化’，或将内蒙古中南部袋足器出现以前新石器时代诸遗存统称‘白泥窑文化’的建议”^[7]。最近又把近年新发现的准格尔旗永兴店和白草塔遗存命名为“永兴店文化”^[8]。在同一篇文章中，又把仰韶时代晚期的“海生不浪文化”舍弃，改用“庙子沟文化”的名称；把朱开沟文化遗存的“一至四段以单耳鬲和双耳罐为特征的遗存”归入“客省庄文化系统遗存”；把朱开沟“以蛇纹鬲、绳纹三足瓮、盆形甗、侈沿盆、带纽罐为特征的朱开沟丙组器物群”命名为“朱开沟文化”，而将与这些器物伴出的其他器物统统命名为大口二期文化^[9]。据上述不完全统计，将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诸遗存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已近二十种之多。如果说这些命名出自诸多学者的意见，因认识不同而出现这种现象也许还可以理解，奇怪的是，这些众多考古学文化（类型）名称竟出自一家之口。

要想对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研究，需要在分析各个典型遗址发掘材料的基础上，采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基本方法，从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入手，再结合影响各时期文化发展的生态环境，考察这一多种考古学文化汇集地区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来龙去脉，才可能得出近乎科学的结论。当然，我在研究这一课题时，虽有亲身的发掘经历，但因学识有限，在以前所发表的文章中亦有许多不足之处。本文所论述的见解，凡与我以前文章中意见相悖的地方，均以此文为准，不再一一说明。

这里首先以自然环境和物质文化演变最敏感的岱海地区为代表，再扩及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试分析如下。

二、岱海地区两个剖面的启示

岱海地区两个剖面，一是指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二是指生态环境变化形成的自然沉积剖面。

岱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是在1980年发现了老虎山石城聚落遗址后才开始的。198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干部训练班在老虎山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在1983年第二次发掘后^[10]，我写了《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年代》一文，把内蒙古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从早至晚划分了八个阶段（期）^[11]。1986年，全区文物普查领队培训班在老虎山和二里半遗址进行了发掘实习，随后又在

岱海和准格尔旗地区进行了全面文物普查。在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普查的基础上^[12]，我又重点调查了岱海沿岸的红台坡、东滩和王墓山遗址^[13]，并试掘了板城、面坡、西白玉遗址。为配合建设工程，郭素新发掘了园子沟遗址。同时，受北京大学考古系之托，带领北大考古系硕士研究生又发掘了杨厂沟和三道沟遗址^[14]。

上述在岱海周围所发现的各时期遗址，文化性质单一，文化面貌单纯。结合内蒙古中南部的其他考古发现，我撰写了《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和《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两篇文章^[15]。在这两篇文章中，分别命名了仰韶时代晚期的“海生不浪文化”和龙山时代早期的“老虎山文化”。其中“海生不浪文化”又划分出岱海—黄旗海地区的“庙子沟类型”、南下黄河两岸的“白泥窑子类型”和包头阴山南麓的“阿善类型”。“老虎山文化”以岱海地区的老虎山遗址为代表，称之为老虎山文化“老虎山类型”，相当于这个时期的包头地区阿善三期遗存，仍归入了海生不浪文化“阿善类型”，只是延续时间长罢了。当这两篇文章正要发表之际，又发现了王墓山坡下遗址，这样就把内蒙古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划分了九期 15 段。此后，在《内蒙古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一文中，又把以后岗一期文化因素为主的红台坡下遗存命名为“红台坡下类型”，把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过渡类型的王墓山坡下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王墓山下类型”^[16]。

综合起来，在岱海地区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有以鼎、小口瓶和红顶钵为代表的红台坡下遗存，属后岗一期文化；有以重唇口尖底瓶、变形鱼纹盆为代表的王墓山坡下遗存，为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类型过渡型文化；有以小口双耳鼓腹罐、敛口曲腹钵和直口折腹钵、筒形罐为代表的王墓山坡上和东滩遗存，属海生不浪文化；有以素面夹砂双耳（双釜）罐、斚或斚式鬲、高领篮纹罐为代表的老虎山、园子沟、板城、面坡和西白玉等遗存，属老虎山文化；有以三足瓮、蛇纹鬲为代表的杨厂沟、三道沟和板城等遗存，属朱开沟文化三、四段遗存。

经详细研究后发现，岱海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经历过短暂时间的发展后，即被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过渡型文化取代；海生不浪文化虽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与老虎山文化之间尚有空缺；老虎山文化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之后，距朱开沟文化三、四段之间仍有距离。造成这种文化间歇现象的原因何在？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于 1988 年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合作，开展了岱海地区的环境考古工作。看来岱海地区各种文化的出现与消失，生态环境的变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由于岱海地区正处于北方季风尾闾区东西摆动的中轴线上，即农牧交错带东西部的转换地带，加上岱海地区地貌环境较复杂，有山地、丘陵、平原、沙地和台地，尤其岱海湖的影响，使该地区的气候变化比内蒙古中南部其他地区更敏感^[17]。从岱海西部老虎山遗址东侧自然沉积剖面看，共发现了距今 6900~1900 年之间的五个湿润期发育起来的古土壤（均为树轮校正年代，下同），分别为距今 6900~6600、5800~5000、4800~4500、3600~3100、2500(?)~1900 年。结合岱海地区其他沉积剖面的研究成果^[18]，可以看出其气候变化与自然景观是：在距今 11000 年左右气候回升；在距今 8000 年以

前有过一段寒冷期,如弓沟沿剖面出现的融冻褶皱,岱海地区的气温降到年均温度 0°C 以下;至距今8000年时出现重大转折,进入了温暖期,但温暖期保持不久;直至距今7300年以后才转向温和湿润,孢粉分析表明,属森林草原植被;在距今6600年前增温至最高点,一直持续到5000年前后;以后温度逐渐降低。这期间有过两次短期降温事件发生,即距今6600年前后和距今5000年前后,在岱海东河沿剖面发现的两层融冻褶皱层即在这两个时期内形成的。从岱海苜花河口剖面提供的信息看,大约在距今4800年左右出现了凉湿的稳定环境,也是森林草原景观,一直延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其间从岱海苜花河测定的10000年冷暖变化曲线看,距今4300年前后岱海地区的气温几乎降到 0°C 左右^[19]。在距今3600~3100年间,虽属凉湿环境,但从3500年以后的芦苇厂剖面看,总体反映了晚全新世逐渐向凉干方向发展的趋势。至距今2500年以后,气候又向暖湿方向转化。

由于岱海湖的影响,文化景观在同一时代呈现出沿湖等高分布,充分体现了湖泊环境同心状影响。如岱海周围古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是:相当于距今7000年的后岗一期文化遗址,分布高程为海拔1350米左右;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王墓山坡下遗址,分布的高程为1270米以上;距今5800~5000年间的海生不浪文化遗址,从早到晚分布的高程约1290~1300米;距今4500~4300年间的老虎山文化遗址,分布的高程为1300米以上;而相当于汉代和汉以后的文化遗址,则分布于1250米以下的湖边二三级台地上。

这就是岱海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所显示的特殊规律,其间的不同文化更替和间歇现象,无不受降温的影响。

三、内蒙古中南部考古学文化谱系分析

上述的鼎、鬲、筒形罐分别是北方三大文化区的标识物,也是各区各种文化中最活跃的因子,抓住这些代表性器物的谱系研究,可以透视各文化所代表的人群在内蒙古中南部的势力消长和流动方向。

1. 仰韶时代

从岱海地区后岗一期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过渡类型两种单一文化的更替情况看,内蒙古中南部早期原始农业文化可能是外地传入的。当后岗一期文化继续西进时,出现了像包头西园⑤组和阿善H32那样的遗存^[20],典型器物以弦纹罐、红顶钵和小口壶为代表。当这种文化继续南下时,在鄂尔多斯与早已溯黄河北上的半坡类型文化相遇,出现了以红顶钵、宽带彩钵、弦纹夹砂罐等后岗一期文化因素与半坡类型文化因素相结合的文化遗存,如白泥窑子F1^[21]。该类遗存的主体文化因素渊源于半坡类型,同时又受到后岗一期文化的影响^[22]。由于鄂尔多斯东部始终不见杯形口尖底瓶、鱼纹等彩陶图案,而鄂尔多斯西部有杯形口尖底瓶,却见不到后岗一期文化因素,因此鄂

多斯东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所表现的现象,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先后存在这两类遗存(后岗一期文化和半坡文化)的事实,可能是他们进行角逐的结果”^[23]。

从岱海地区王墓山坡下遗址的发现看,该类遗存与关中地区不一样,那里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泾渭分明,互不混杂。而类似王墓山坡下这种遗存,可能是半坡晚期和庙底沟早期的人群在沿汾河谷地北上时相遇,并且在北上途中又吸收了当地的土著文化,因而出现了半坡晚期和庙底沟早期两种文化因素相混杂的文化类型。因王墓山坡下遗址发掘的面积较大,遗迹布局清楚,出土遗物丰富,类似遗存在内蒙古中南部普遍存在,故命名为仰韶文化“王墓山下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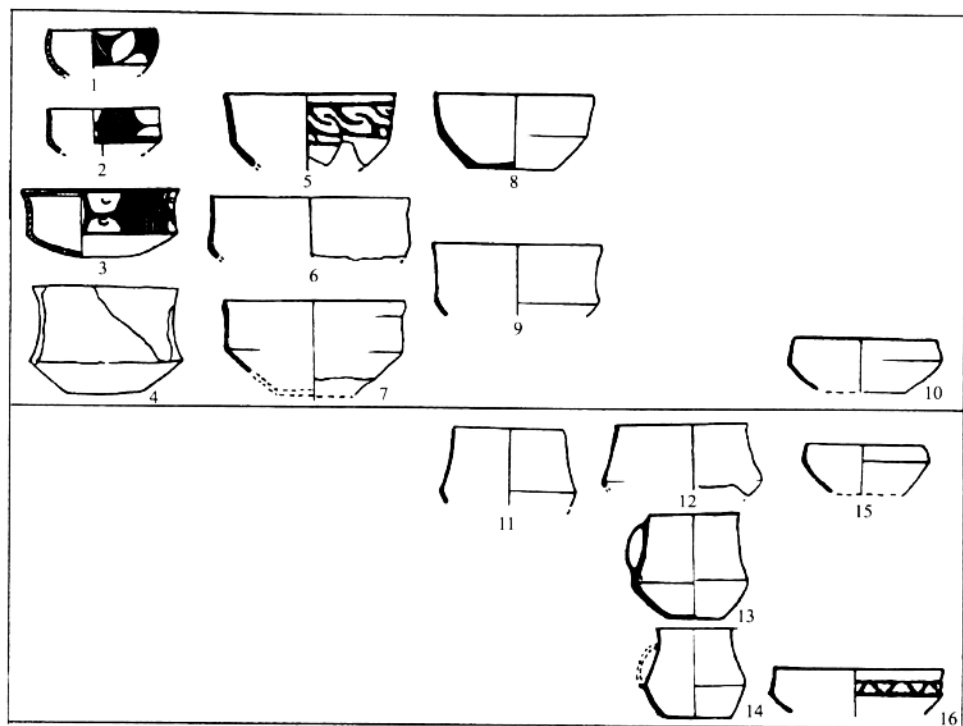
此后,以单唇口尖底瓶和圆点勾叶纹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物在内蒙古中南部有广泛的分布。

至仰韶时代晚期,明显看出有一支文化又踏着后岗一期文化的足迹而来,这就是太行山东侧的大司空文化。在大司空文化西进的同时,还有以筒形罐和鱼鳞纹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因素相伴而至,与当地以小口尖底瓶为代表的文化相碰撞、融合,才形成了当地的土著文化——海生不浪文化。

为了弄清海生不浪遗址的文化内涵,1989年,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呼和浩特市文管处共同组成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24]。发掘结果证明,该遗址虽遭晚期人为和自然的严重破坏,但文化内涵清楚,并经历了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这个早已为学界所熟知的遗址,具备了命名为一个单独的考古学文化的条件。

详细分析海生不浪文化的主要因素,仍可分为东西两群。主要器物组合有小口双耳鼓腹罐(水器)、小口尖底瓶、筒形罐和各种敛口曲腹钵、直口折腹钵(盆)等。众所周知,位于太行山东西两侧的两大系统文化的水器差别是明显的。太行山东侧,后岗一期文化和大司空文化主要使用小口双耳瓶、壶、罐为水器;太行山西侧的仰韶文化则主要使用小口尖底瓶及小口瓶为水器。因此,海生不浪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小口双耳鼓腹罐,显然属太行山东侧的文化系统,而且这种双耳罐的桥形耳以榫卯装接的方法,也是太行山东侧的传统制法。海生不浪文化中普遍流行的敛口曲腹钵和直口折腹钵,是大司空文化的典型器物,其演变规律也与大司空文化相同(图一,1~10)。根据陈冰白的研究,大司空文化是在“下潘汪类型”的基础上,受后岗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双重影响而形成的。大司空文化(尤其是早期)与庙底沟文化在时间上也有部分重合^[25]。因此,海生不浪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小口双耳鼓腹罐、敛口曲腹钵和直口折腹钵等,显然是来自于大司空文化。海生不浪文化中的彩陶纹饰,如鱼鳞纹、三角纹、菱形格子纹等同本区仰韶早中期文化之间没有继承关系,除鱼鳞纹外,均是大司空文化中常见的花纹。

海生不浪文化另一种代表性器物——筒形罐,包括彩陶上的鱼鳞纹,显然是来自东部红山文化系统。但红山文化的筒形罐,外表均饰以横之字篦点纹,而海生不浪文化的筒形罐外表则饰以交叉绳纹或划纹。在岱海地区,海生不浪文化的早期,这种筒形罐就



图一 仰韶、龙山时代陶器

1~4. 大司空文化(下潘汪 H74:5、下潘汪 H99:5、南岗 F1:2、台下 F27③:8) 5~10. 海生不浪文化(HH1:18、DH3:6、WH1:20、BLT1④:46、BLG1:04、BAT10④:02) 11~16. 阿善文化(LH3:6、西园 H81:5、BAH71:01、BAH3:01、BAT5③:05、BAH31:04)(1~10为仰韶时代, 11~16 龙山时代)

已经出现,其花纹与红山文化同类器明显有别,而与小河沿文化筒形罐的纹饰一致。这种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红山文化筒形罐直接传入内蒙古中南部,受当地文化影响而出现了交叉绳纹;二是红山文化在西进途中,受其他文化影响或融入其他文化中,再传入内蒙古中南部。

1982年冀中容城午方遗址的发现^[26],似乎为解释内蒙古中南部与东南部的文化联系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线索。午方遗址第2层以数量可观的素面夹蚌陶和与之相伴的“半重环纹”彩陶钵区别于第3层所代表的前一阶段遗存。午方第3层所含的平底弧腹钵与大司空文化早期的钵、碗类BI形式形态相近,而圜底钵则显示了更早的特征,故其年代不晚于大司空文化的早期。午方的前后两段是衔接的,后一阶段的年代不会晚于大司空文化中期的最早阶段。易县北福地第二期H14与午方第2层性质相近,但年代要晚些^[27]。午方遗址不仅与“秦王寨类型”、山东大汶口文化和小河沿文化有密切关系,甚至还和老虎山文化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文启明把午方遗存和小河沿文化的关系做图对比^[28],从中可以看到两者主要器物

的一致性。其中的敛口曲腹钵，从造型到彩陶纹饰几乎别无二致，两种文化的小口高领鼓腹罐也很近似。

我以前在文章中提到海生不浪文化与小河沿文化的关系时，过多强调了小河沿文化受海生不浪文化的影响，今天看来，这两种文化可能都一定程度地受大司空文化或午方遗存的影响。

上文提到，后岗一期文化西进时与半坡文化相遇，融入当地文化之中；大司空文化西进到鄂尔多斯东部时，其主要文化因素也被当地文化吸收；而当地传统的以小口尖底瓶为代表的系列因素则经久不衰，继续保留下来，成为构成海生不浪文化的三大标识物之一。

海生不浪文化的分布地域不大，仅限于南下黄河两岸以东和以北地区。该文化在鄂尔多斯南下黄河两岸地区，由小口尖底瓶、小口双耳鼓腹罐和筒形罐为代表的三种文化因素组成，前两种器物发展序列完整，筒形罐发展序列则不够完整；在岱海地区，由小口双耳鼓腹罐和筒形罐两个系统文化因素组成，这两种代表性器物发展序列完整，但始终不见小口尖底瓶；在包头地区，小口尖底瓶、小口双耳鼓腹罐和筒形罐三种代表性器物发展序列均不完整，但敛口曲腹钵和直口折腹钵（盆）格外发达。因此，我把海生不浪文化划分为“白泥窑子类型”、“庙子沟类型”和“阿善类型”。

现在看来，如上文所述，海生不浪遗址经发掘后，文化内涵清楚，比白泥窑子遗址更具代表性，而白泥窑子遗址包含有几种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内涵复杂，不具典型性，因此可以将“白泥窑子类型”改称为“海生不浪类型”。这样可能更准确些，也比较规范化。

庙子沟遗址发掘规模较大，出土的遗迹和遗物亦较丰富，在岱海和黄旗海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它缺少了构成该文化特征器群的三大标识物之一——小口尖底瓶，故仍把庙子沟一类遗存称之为海生不浪文化“庙子沟类型”为妥。

“阿善类型”以比较发达的敛口曲腹钵和直口折腹钵区别于其他两个类型。我原认为在阿善二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阿善三期遗存仍属于海生不浪文化范畴的意见，是基于阿善二期遗存的敛口和直口折腹钵的演变序列提出来的。从文化因素角度看，阿善二期的敛口和直口折腹钵发展至阿善三期早段的单耳垂腹罐等新器物，显然是因下文将提到的陇东地区同期文化的介入，已属于另一个文化范畴。因此，海生不浪文化“阿善类型”应只包括阿善二期一类遗存。

2. 龙山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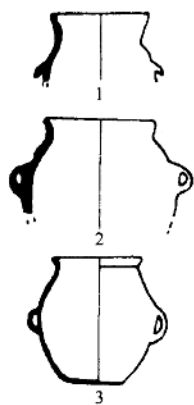
从包头地区阿善二、三期连续发展的遗存看，海生不浪文化“阿善类型”的敛口和直口折腹钵发展至阿善三期早段，出现了上腹较高、下腹圆鼓的折腹钵，及其衍生器——单耳垂腹罐和敞口折腹盆等^[29]，至阿善三期晚段，在钵、盆的折腹处起凸棱，并在棱上装饰有连点锥刺纹，其上腹部还经常装饰有连点锥刺几何形图案（图一，11~16）。近年在准格尔旗发现的小沙湾^[30]和白草塔二期遗存，显系由小口尖底瓶向篮纹高

领罐演变的过渡性遗存。其陶器的纹饰（横篮纹为主）和风格，与阿善三期早段近似。这时出现的单耳或双耳垂腹罐，其“桥状耳”的造型及制法，可能受陇东地区的文化影响。阿善三期晚段出现的连点锥刺纹、石筑围墙及祭坛等文化因素，显系东部红山文化影响所致。该文化除继承小口尖底瓶和敛口、直口折腹钵等早期文化因素外，又吸收了来自东部，特别是西部的文化影响，显示出与老虎山文化有明显差别。该文化的陶器组合和作风，与陕西绥德小官道遗存属同一文化系统^[31]，还应包括我原来划入海生不浪文化的白泥窑子 BLH3、BCF3 组和朱开沟Ⅶ区的 H7008 组^[32]。因此，崔璇和杨杰提议把该遗存命名为“阿善文化”的意见可取^[33]。

在海生不浪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老虎山文化，除吸收了小沙湾的由喇叭口高领尖底篮纹罐发展成高领折肩篮纹罐因素外，其主要文化因素开始向尖底腹罍—罍式鬲方向发展，故苏秉琦先生早在 1984 年就指出：“约距今 5000 年前后，从包头到凉城横剖面，东西两部，分道扬镳”^[34]。即“阿善文化”以平底器为主，“老虎山文化”以三袋足器作为炊器，东西相别。这两种文化的分界线似在南下黄河东岸。老虎山文化的标识物是由尖底腹罍—罍式鬲和素面夹砂双耳罐两个谱系的陶器组成。这个地区的筒形罐，随着海生不浪文化的结束而消失。

组成老虎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有尖底腹罍—罍式鬲、罍式甗、篮纹高领罐和素面夹砂双耳罐等。从尖底腹罍底部的制法看，与小口尖底瓶底部的制法相同；某些罍式鬲的袋足，从其内壁留下的褶皱看，也与末期尖底瓶底部的制法相同。一般认为，釜形罍的出现是受釜的影响。从老虎山文化早期泥质釜形罍和夹砂尖底腹罍伴出的情况看，尖底腹罍的出现显然受釜形罍的启发，但其制法却是尖底瓶的传统。故苏秉琦先生认为，诱发尖底腹罍三袋足器的出现，与小口尖底瓶有关，认为“殷墟甲骨文字中‘酉’字有

的和这种小口尖底瓶（它的末期阶段）惟妙惟肖，有的‘丙’字，像尖底腹罍（仅仅是这个时期同小口瓶共生的一种型式），有的像鬲”^[3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从准格尔旗小沙湾发现的喇叭口高领篮纹罐，其底部尚保留有与末期尖底瓶底部一样的突状纽，而其上部特征则与老虎山文化中与罍式鬲伴出的篮纹高领罐完全一致。这也证实了苏秉琦先生于 1984 年推断的“黄河东西两侧，这期间一个突出发展是，尖底瓶末期与尖底腹罍的交错共存”的观点是正确的。由于高领罐的尖底放立不稳，便很快消失，变成了富有特征的小平底高领篮纹罐。老虎山文化中出土数量最多的素面夹砂双耳罐，由于容城午方和易县北福地的发现（图二），才找到了这种器物的原生地，即可能在太行山东侧冀中一带。这种器物在昌平雪山^[36]、张家口贾家营^[37]、蔚县三关^[38]、辽西小河沿^[39]和石棚山^[40]等地均有发现。这种器物在本区老虎山文化结束后即消失。



图二 素面夹砂双耳罐

1. 北福地 H14 出土 2. 午方第 2 层出土 3. 园子沟出土 (F3029:2)